

# 仁义为火，礼信作盾：儒家文化滋养下济宁抗战精神的实践图景

王恒香

中共曲阜市委党校，山东济宁，273100；

**摘要：**本文以济宁地区为研究对象，探讨儒家文化对当地抗战精神的滋养与实践图景。首先追溯儒家文化在济宁的历史沉淀，包括思想起源、士绅传承、建筑仪式象征及近代调适；继而从士绅引领、民众动员、文化抗战、信仰融合四个维度，展现儒家“仁义忠信”思想在抗战时期转化为救亡行动的具体实践；最后提炼济宁抗战精神的内核（仁、义、和）及其当代价值，揭示传统文化在民族危机中的凝聚力与时代启示。研究表明，儒家文化不仅是济宁抗战的精神根基，更为现代文明互鉴与文化自信提供了传统智慧。

**关键词：**儒家文化；济宁抗战；仁义礼信；士绅阶层；文化抗战

DOI: 10.69979/3029-2700.26.02.062

八十年前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，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历久弥新。在孔孟之乡济宁，浸润千年的儒家文化以“仁义忠信”为精神火种，点燃了这片土地上抵御外侮的信念，将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，熔铸成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。

## 1 从杏坛遗风到抗战薪火：儒家文化在济宁的精神沉淀

济宁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，洙泗河畔孕育孔子“仁礼”、孟子“义利”内核，经士绅实践、建筑仪式传承及近代调适，将伦理化为地域基因。这种文化韧性为抗战精神奠基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根源。

### 1.1 洙泗河畔的文明觉醒：儒家思想的起源地标与地域奠基

曲阜尼山作为孔子诞生地，洙水、泗水环绕的地理格局，早在春秋时期便成为儒家文化的“基因产房”。孔子在此开坛讲学，以“仁”为核心构建伦理体系——《论语·颜渊》载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将个体修养与社会秩序紧密联结；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则以“义”为标尺，提出“舍生取义”的价值准则。这种“仁为体，义为用”的思想架构，通过杏坛讲学、周游列国的传播路径，在济宁形成以“礼义之邦”为标识的文化共同体。至汉代“独尊儒术”后，济宁境内孔庙、孟庙的兴建（如汉元帝时期重修孔庙），更将儒家思想从民间学说升华为官方意识形态，奠定其千年不衰的文化根基。

### 1.2 士绅阶层的文化代言：从经学到实践的在地化传承

儒家文化在济宁的生命力，不仅体现于典籍传抄，更在于士绅阶层对“修齐治平”理念的躬身践行。明清时期，济宁士绅以“耕读传家”为准则，在城乡广设义学（如明代滋阳人牛运震创办“陇上书院”），将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教育与乡约教化结合，使“忠孝节义”渗透到基层社会肌理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，传统士绅是“文化权力”的载体，他们既是儒家伦理的传承者，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。例如，清代济宁直隶州的士绅群体，既遵循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路径，又在灾荒年间组织赈济、兴修水利，践行“仁者爱人”的社会责任。这种“学术精英+社会贤达”的双重身份，使儒家伦理从书本教条转化为可感知、可参与的生活方式，培育出济宁人“崇文尚礼、务实担当”的群体性格。

### 1.3 建筑与仪式中的文化编码：空间场域的精神象征

济宁境内星罗棋布的儒家文化地标，构成独特的“文化景观叙事”。曲阜孔庙大成殿的盘龙石柱、杏坛的重檐十字脊，以建筑符号诠释“礼”的秩序感；邹城孟庙“亚圣殿”的楹联“尊王言必称尧舜，忧世心同切孔颜”，则将孟子的政治理想具象化。王鲁民在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探析》中提到，传统建筑是“凝固的文化符号”，通过空间布局与装饰细节传递价值观念。每年春秋丁祭的释奠礼，从迎神、初献到送神的37道仪程，

使“礼”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体验的仪式行为——参与者在佾舞、雅乐中感受“恭谦庄敬”的文化气场，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传承，让儒家价值观超越代际，成为地域认同的核心要素。至抗战前夕，这些文化空间虽历经战火，仍作为精神图腾存续，为军民的文化抵抗提供情感寄托。

#### 1.4 危机中的文化韧性：近代变局下的儒家思想调适

当近代西潮冲击传统社会，济宁的儒家文化展现出独特的韧性。洋务运动时期，济宁士绅既坚守“中学为体”，又倡导“西学为用”——如济宁籍官僚孙毓汶支持创办同文馆，在儒家“经世致用”思想框架内接纳现代科技。据《济宁直隶州志·人物志》记载，孙毓汶曾言：“器可变而道不可变，西学之技可师，而中学之本不可弃”；戊戌变法期间，本地学者编成《济宁直隶州志·艺文志》，以考据学方法整理儒家文献，试图在变局中维系文化根脉。这种“固本开新”的姿态，为抗战时期儒家文化与民族救亡的结合埋下伏笔——当日军铁蹄踏入孔孟之乡，曾经滋养士绅阶层的“忠义”观念，迅速转化为“毁家纾难”的行动逻辑，使传统文化成为抵御殖民文化侵略的精神武器。

### 2 孔孟遗韵化战歌：儒家文化浸润下的济宁抗战群像

抗战时期，儒家文化激发多元抗战力量：士绅以“忠义”引领救亡，民众借乡约智慧开展游击，文化界以笔重构认同，多元信仰在“和而不同”中凝聚。诸实践展现儒家伦理与救亡图存的深度共振。

#### 2.1 士绅阶层的家国担当：以“忠义”为旗的抗战引领

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，传统士绅是“文化权力”的载体，他们既是儒家伦理的传承者，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。抗战爆发，济宁的士绅阶层率先响应，以儒家“忠义”为信念，投身抗日救亡。孔氏家族后裔孔德成，身为衍圣公，虽因局势被迫南迁，却在临行前发表抗日通电“孔氏子孙，世受国恩，大义所在，万不能屈膝事仇。”，声明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为曲阜乃至整个济宁的抗战行动定调。其言辞如炬，激励无数乡人奋起。这不仅是个人气节的彰显，更是儒家“忠君爱国”思想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升华——将对王

朝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和国家的守护。

在邹城，乡贤孟昭琪散尽家财，召集族中子弟与周边青壮年，组建抗日自卫队。他常以孟子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教诲训诫队员，这支队伍秉持忠义，在当地伏击小股日军、破坏敌军交通线，多次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，这正是儒家“义利之辨”的生动实践——当个人利益与民族大义冲突时，毅然选择“舍生取义”。在后方，众多士绅凭借自身威望，组织募捐活动，筹集棉衣、粮食、药品等物资，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，践行着儒家“仁爱”“济众”的理念。

#### 2.2 民众动员中的儒家智慧：乡约纽带下的全民抗战

儒家倡导的“邻里相恤”“出入相友”理念，成为济宁民众凝聚力量的精神纽带。在邹县，1938年春，在乡绅王德一的带领下，南亢阜村青壮年手持自制土枪、长矛，组建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。他们白天在田间劳作维持生计，夜晚于祠堂内研习《孙子兵法》片段，将儒家“足食足兵”思想与游击战术结合。日军进犯时，村民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利用“地道战”“麻雀战”等灵活战术，在三个月内成功击退敌军7次小规模侵扰，保护了村落安全。

微山湖地区的渔民群体，则将儒家“和为贵”思想与抗争精神巧妙融合。1939年，微山湖畔的老渔民张茂田召集30余艘渔船，成立“湖上抗日运输队”。他常对队员说：“孟子讲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’，咱们虽穷，但绝不能让鬼子踩在头上！”这支队伍以湖汊芦苇为天然屏障，改装渔船暗设夹层，为八路军秘密运送弹药、药品。1941年冬，运输队在突破日军封锁线时遭遇巡逻艇，渔民们急中生智，将物资沉入湖底，佯装捕鱼。待日军离开后，队员们冒着严寒潜入冰冷湖水，凭借“人在物资在”的信念，成功保全全部军需品。在三年多的抗战中，微山湖抗日力量累计运送物资千余吨，护送干部战士2000余人次，被誉为“鲁南水上生命线”。

#### 2.3 文化抗战的独特篇章：以笔为刃，捍卫精神家园

在战火纷飞中，济宁的文化界人士以笔为枪，借儒家经典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。学者们纷纷撰写文章，发表在当地报刊与流亡后方的学术刊物上。如济宁籍学者张庆霖，在《论春秋大义与抗战精神》一文中，深入剖

析《春秋》中“尊王攘夷”思想，将日本侵略定义为“文化灭种”的危机，指出日本侵略是对华夏文明的践踏，呼吁民众团结起来，捍卫民族尊严。

民间艺人也不甘落后，将儒家倡导的忠勇故事改编成戏曲、评书，在乡村集市、城镇茶馆中表演。以《水浒传》故事为蓝本改编的《铁道游击队》戏曲，融入儒家“替天行道”的内涵，生动展现了济宁军民的抗日壮举，在民众中广泛传唱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，使儒家文化在文化抗战的战场上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## 2.4 信仰融合与抗战合力：多元信仰下的统一战线

济宁作为多元信仰汇聚之地，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促进了不同信仰群体在抗战中的团结。在济宁城区及周边乡镇，清真寺的阿訇们在讲经时融入爱国元素，鼓励穆斯林群众投身抗战，保卫家园。济宁的天主教、基督教教会，在儒家“爱人如己”思想影响下，开放教堂作为避难所，收留了众多难民，部分神职人员还秘密为抗日武装提供医疗救助、传递情报。1938年成立的“济宁各界抗日救国会”中，既有孔氏后裔等儒家代表，也有阿訇、道长等宗教领袖，他们通过讲经布道、宗族议事等形式，动员群众捐粮捐物、传递情报。这种信仰与政治的有机结合，将传统伦理资源转化为抗战动员力量，使统一战线在济宁这片土地上焕发出强大生命力。不同信仰背景的人们，在儒家文化“和而不同”“天下大同”理念引领下，超越信仰差异，携手并肩，共同构筑起抗击日寇的坚固防线，为抗战胜利贡献出独特力量。

## 3 儒脉铸魂，薪火永续：济宁抗战精神的基因解码

济宁抗战精神以儒家“仁义”为内核：“仁”化家国情怀，“义”凝舍生抉择，“和”聚统战力量。其不仅是历史文化抵抗的见证，更在当代为文明互鉴、文化自信提供传统智慧与时代启示。

### 3.1 精神内核提炼：儒家文化与济宁抗战精神的基因解码

济宁抗战精神的内核深处，镌刻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印记。“仁”的思想升华为“天下大同”的家国情怀，使济宁军民超越个体安危，以守护文明火种为己任；“义”的准则凝结成“舍生取义”的壮烈抉择，孔氏家族通电抗日、乡绅毁家纾难，皆是对儒家道义的躬身践行。这种精神并非简单的文化传承，而是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中，将“修身齐家”的个人追求，转化为“保家卫国”的集体行动，形成“文化认同——民族觉醒——抗争实践”的完整链条。同时，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智慧，更推动济宁多元群体打破信仰与阶层界限，构建起坚不可摧的抗日统一战线，展现出传统文化在危机时刻的强大凝聚力。

### 3.2 当代价值阐释：历史镜鉴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

八十年后的今天，济宁抗战精神中蕴含的儒家智慧依然焕发蓬勃生命力。在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当下，“天下大同”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，提醒世人以包容态度化解文明冲突；而“居安思危”的忧患意识，则为和平年代敲响警钟，警示我们铭记历史、珍视和平，在多元激荡中以包容聚共识，于和平岁月用忧患励初心。如今，孔庙的盘龙石柱仍在诉说往昔，而儒家文化滋养的抗战精神，正化作新时代的文化自信，照亮民族复兴的前行之路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富金壁.杨伯峻先生《论语译注》商榷[J].内江师范学院学报,2024,39(03):120-128.
- [2]费孝通.乡土中国 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48:45-47.
- [3]周学鹰.乐者敦和能者桢干:读刘敦桢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有感[J].建筑创作,2007,(09):134-138.
- [4]杨洋.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——以萧公权著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为例[J].福建论坛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14,(09):75-81.